

#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 ——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考察

朱慈恩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信仰的学术信念和价值目标是唯物史观,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在研究实践中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进行论战,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社会史论战;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学术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7)05-0060-07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历史事实出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学流派,其形成始于3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叶桂生和刘茂林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战斗中产生与发展的历程。<sup>[1]</sup>美国学者德里克侧重于论述3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起源性质诸问题。<sup>[2]</sup>本文则试图从学术共同体的视角来论述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科学发展史上,从事相关研究的具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并遵循共同的学术研究路径的群体就是所谓的学术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积极投入了社会史论战,并且在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方面以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另一方面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战斗,体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 一、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道路

自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从李大钊开始,李达、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还在中共党史、工农运动史等领域中出版了一批论著,如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刘少奇《安源路矿俱乐部略史》、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等等。

收稿日期: 2017-05-16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接受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17LZUJBWZD032)

作者简介: 朱慈恩,男,江苏苏州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但是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刘少奇、彭湃等从身份上来看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史学家,其著作更多的是被视作革命理论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而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很多史学家如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何干之、吴泽等,都积极参与其中,并在论战的过程中创作了一大批重要的史学论著。可以说,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其研究指导,其学术起点基本上是从中国社会史论战为其发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前途等问题需要做深入的探讨,需要对中国社会性质有正确的认识,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必然会溯及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性质,于是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由此展开。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代表国民党的“新生命派”,代表托派的“动力派”,就其不同的阶级立场,提出并宣传各自的主张观点,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1929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有王学文、吴黎平、李一氓、朱镜我等,出版《新思潮》杂志,与托派和新生命派展开论战。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开始,起初参战的如王学文、潘东周、向省吾、李一氓、吴黎平等,大多是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自然而然地要追溯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从而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1931年《读书杂志》创刊,专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由此展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是通过社会史论战,走上了学术道路。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避居日本,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对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古代史的研究两者是有密切关联的。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的著作,也是社会史论战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对于运用社会形态理论解剖古史起了关键性的导向作用。

吕振羽从1930年开始在《三民》半月刊、《丰台》旬刊等刊物上发表不少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自1933年开始在中国大学执教的同时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等著作。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问世之前,尚无人对此领域做系统全面的研究,吕振羽的研究为史前历史整理出了粗略的系统。

翦伯赞自1930年开始在北平的《三民》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商业资本主义”问题之清算》《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等一系列论文,后结集而成《中国社会史论战集》。《历史哲学教程》(1938)一方面是对社会史论战各家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另一方面则是系统地阐发翦伯赞本人对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的认识。《历史哲学教程》是继李大钊《史学要论》后又一部重要的理论专著。

何干之从1933年开始在《时代论坛》《世界知识》《现世界》《自修大学》上发表一系列论述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史的相关论文,着重探讨了鸦片战争以及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导致了中国的变化,分析了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主义之间相互勾结的关系。何干之的代表作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这两部重要著作都是可以看作是何干之本人对1927年以来理论界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长达十年论战的综合性概括和评述的专著。

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在研究中相互联系、相互探讨、相互影响,从而推动学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体的形成也是如此。1928年吕振羽和翦伯赞相识后即成为莫逆之交,共同关注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在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分析的方法观点十分相近,共同经历了由左翼的爱国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路程。很多学者也正是受到郭沫若、吕振羽等人的影响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道路。侯外庐于1932年在北平读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结合其时正在进行的《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决心沿着郭沫若开创的道路继续深入,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各发展阶段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关系。吴泽于1933年入中国大学经济系,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正轰轰烈烈地展开,吴泽学习了李达、吕振羽等所开设

的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等课程,感到其与“中国社会往哪里去”的论战主题一脉相承。他说“历史、理论、现实本是社会科学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我在大学二年级时的学习和研究方向,也就自然地开始集中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理论和中国社会史方向上来。”<sup>[3]</sup>

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的治史风格、学术观点也不尽一致。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利用了甲骨文、金文的材料,从而对中国古代社会做整体的研究,较之罗、王之学更上层楼。<sup>[4]</sup>相比之下,吕振羽更富理论风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方面建树较多。郭沫若擅长运用考古文字材料,吕振羽更善于运用神话传说,将其神话传说与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相结合,赋予了神话传说以史料上的价值。社会史论战中各家的观点也不尽一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分期说便是典型的例子,这当属共同体内部的论争。

## 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早期阐释

学术共同体是有着共同的学术信念和价值目标的学术群体。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共同信仰的学术信念和价值目标自然是唯物史观。在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科学的理论和丰富的史料结合起来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广泛深入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使得对历史的认识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唯物史观的纲领宏大、体系完备、内容丰富,但最基本的原理即是物质资料生产是整个社会得以存在并且发展的前提,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决定与反作用的关系,这就是“史的唯物论”,翦伯赞对此有很清晰的阐述:

“史的唯物论,并不从一般人们自己所说的,理想的,或矫造的东西出发,更不从神定的教条原理出发,企图探求一个形而上学的‘精神王国’的内容,而是从真实的、活动的、存在的过程出发,以这种存在,去说明由其反映出来的观念诸形态。其他则以为这些观念诸形态,只是观念的历史所反射出来的东西,它们是随着现实生活在历史上之变更而变更的,即‘意识并不决定生活,反之,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类历史之发展的基础,乃是物质生活之生产以及这生产的诸条件——物质的生产力。作为这物质生产力之推动力的,便是人类在实践生活上的斗争。因之某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形成了历史的真正基础,而为该时代的法律、政治乃至宗教、哲学以及一切观念等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由这个基础来说明。”<sup>[5]</sup>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明确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以及分阶段性的特征。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学说是社会史论战的重要理论指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对社会形态的发展做出了清晰的论断,按照当时王学文的表述:

“我们读社会发展史或社会进化史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已经过种种的变迁……按照变化发展之迹,可以分人类社会为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在这些社会形态之中形成其经济的基础的,各有一定的人与人为生产而结成的生产关系,就是说,有原始共有的生产关系,古代的生产关系,封建的生产关系和资本家的生产关系。”<sup>[6]</sup>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方法论应当是相统一的,唯物史观必然是离不开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正如郭沫若所说的“我们的良心假使真正是在‘科学的’观点上说话,在目前除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以外是没有第二种可以采用的。”<sup>[7]</sup>唯物辩证法的使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郭沫若在研究《周易》时,认为《易传》中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一切事物都是“泰必否,否必泰,亨必剥,剥必复,一切都有个尽头,一切都在画着连环

扣”从而辩证地展开一副社会进化的图景,在这辩证的图景中,“一切都有个尽头,一切都没有绝对的尽头;一切都是相对,一切都不是绝对的相对;相生相克,相反相成地,这样进展起来”。<sup>[8]</sup>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这就是当时所强调的“史的一元论”:即马克思主义“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的共同性,在其过程中各个阶段上所表现的特征之一般性(自然,我们并不能忘记普遍中有其特殊性),而且证实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完全符合了史的一元论的法则”。<sup>[9]</sup>但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还需要和中国历史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郭沫若将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比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作,主要是提供了经典作家于希腊罗马之外所未涉及到的中国古代的情况。郭沫若结合文献资料、甲骨文以及民族学上的材料,分析商代已经到了氏族社会的末期,“彭那鲁亚家族”尚存残余,依然还是氏族社会,但阶级分化已经开始出现,对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给予了全新的解释。吕振羽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卢森堡《经济学入门》等著作,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全新的划分,以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待神话传说,开拓了古史史料的范围,“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地毁坏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sup>[10]</sup>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比,社会史论战中的其他派别则多陷于公式主义,无论是陶希圣“三阶段论”、王宜昌“四阶段论”、李季“五阶段论”等中国历史阶段划分,还是“前资本主义”“后封建”“商业资本主义”“专制主义”等概念范畴,大多属无根游谈,没有能够从全面丰富的史料出发,以中国历史的具体实践来对上述理论概念做充分的论证。这就将具体历史事实与社会发展的理论割裂开来,片面地谈论后者,造成公式化和教条化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释和运用,大多集中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以及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至1939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表后,才将阶级斗争置于显著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又将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中国通史的编纂中,标志着延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进入到了新阶段。虽然范文澜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合称“五老”,但是范文澜走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却与其他四老完全不同。范文澜早年师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专治国学。抗战爆发前夕,范文澜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

###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战斗中成长

从外部环境来看,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之间由于理论、方法、观点等方面的差异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间的批评和论争。但在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面对的是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者,政治上的论争和学术上的批评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共同体是在战斗中成长发展起来的。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确认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制度为半封建的制度,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一是驱逐帝国主义,二是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具体到社会史论战中,则需要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对党在“六大”上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进行详细的论证。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阐发和宣传,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何干之认为历史是有机连贯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绵延赓续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同外部帝国主义入侵的内外因的作用之下,注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的属性,同样也“注定了中国民众要负起反帝、反封建这二重任务”。<sup>[11]</sup>这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予以

说明。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自觉地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这一点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敌也都承认:郭沫若“有一点超越了前此各家,就是,他在中国人中是第一个同情于革命同情于工人阶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这一点优越抬高了地位,使他能在风雨如晦的现在获得了广大的读者,使他取得了额外的声誉”。<sup>[12]</sup>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风雨如磐,鸡鸣不已”的年代帮助很多进步青年认清中国革命的前途,坚定了对中国革命的信心。甚至于一些“乔装为‘历史家’面目出现的殷代社会研究者,无论在材料上,在结论上,大都不过是从郭著片段的抄袭,而又把它加以歪曲,以粉饰其可鄙的固有的成说,且从而又去反诘郭氏”。<sup>[13]</sup>翦伯赞的史学论著“能寓科学性、党性于优美而流畅的诗一般的文字语言中”,<sup>[14]</sup>因而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何干之于1936年完成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论证了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工农联合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至1938年6月已出七版。张仲实回忆说,“这本书当时影响较大,给我印象很深。”<sup>[15]</sup>翦伯赞原来计划写一部全面系统的社会史论战专著,但当抗战爆发后就放弃了该项研究,转而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去。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论是参与社会史论战还是脱离社会史论战,都体现着其战斗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党性,决定了其具有了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体现出来的党性成为了与其他史学流派的最根本的差别。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学研究为郭沫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郭沫若评价罗、王之学方法是科学的,感情是封建的,而郭沫若本人的研究则贯彻着无产阶级的党性,阶级立场是郭沫若与罗、王的根本分野。

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同的是,在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面对的除了少数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外,多数的则是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与各种各样的假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并且彻底批判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战斗性的又一体现。正如翦伯赞所说“对于这些含有毒性的理论之拔根铲除,是我们的责任。”<sup>[16]</sup>在社会史论战中,托派以任曙、严灵峰为代表,包括了刘仁静、彭述之、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新生命派则有陶希圣(方岳)、顾孟余(公孙愈之)、梅思平、王志瑞、熊得山、陈邦国、朱伯康、梁园东、戴行轺、黎际涛等。后来加入的还有读书杂志派的王礼锡、胡秋原等,大多采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再加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对中国历史进行曲解。最典型的商业资本主义理论。

商业资本主义由俄国学者波格达诺夫提出,波克罗夫斯基将其进一步发挥,主张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插入一个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托派的拉狄克将其运用于中国历史分析,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即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占据了支配地位,近代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时期。再进一步即是否认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托派、新生命派以及后来的读书杂志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商业资本主义理论。例如梅思平即认为秦国在战国末年是一个最大的商业国,秦的统一是商业资本的胜利,秦以后的中国便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陶希圣提出了“封建社会破灭论”,意即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并非封建社会,由此否定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最终目标是要否定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明确提出“由东周以至清末,是封建社会,这是三五年来,以最正确的方法和最可靠的史料所证明了的。”<sup>[17]</sup>托派和新生命派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视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而然地就否认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是要否认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任务。因此,对于商业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方向等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吕振羽在提出西周封建论的同时,强调了“资本主义列强未侵入前的时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业已开始孕育;但自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后,那个未出世的资本主义婴儿,便被绞死了。以后便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

态”。<sup>[18]</sup>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历史,使得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其革命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自觉地以其学术研究服务于革命事业,体现出了高度的党性和战斗性。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作品,更是宣传革命以及阐释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唤醒人民斗争的重要武器。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体现出的战斗性,借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说法,即“马克思主义底发展,劳动阶级中的马克思思想之普及和加强,必然要唤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有产阶级的反攻之频发和激化,马克思主义就这样的在御用学者底每一‘粉碎’时,益发强固起来而成为更加精炼更加犀利的东西了”。<sup>[19]</sup>

####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时代价值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以《读书杂志》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显示的力量还是比较微弱的。<sup>[20]</sup>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成果,有的被自己所否定,有的需要不断地补充完善,但其基本结论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多元化思潮的冲击,唯物史观也面临着挑战,在史学研究中也不乏各种去马克思主义化的现象,故此社会史论战中的相关研究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教条化、机械化的特征,有的论著在反对教条化、机械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连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一概否定。但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一贯都是站在教条主义的对立面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是很好的范例,其与众不同之处即在于能够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与上古文献相结合,对于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社会史论战中的焦点之一是奴隶社会有无问题。80年代以来受苏联影响而出现了各种“无奴”说,即否定奴隶社会的存在。对于奴隶社会有无,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早期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论证,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从财产占有、阶级成分以及国家形态等方面对商代的奴隶社会做了详细的论证,翦伯赞对奴隶社会从理论到现实做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奴隶社会并非是希腊、罗马所特有,奴隶制度为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之一,中国自然也决不例外。近现代史的领域中,去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以西方的现代化研究范式来取代革命史研究范式,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看成为是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帝国主义入侵导致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等内容都被消解。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重要成果就是肯定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加以系统丰富的论述而成为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结论。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需要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来丰富发展唯物史观,抵制和批判种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其指导的错误倾向。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已经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注释:

[1]叶桂生、刘茂林《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1期。

[2]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3]吴泽《我的治学历程和史学观》,《史学家自述》,张艳国主编,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 [4]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1-162页。
- [5]翦伯赞《历史科学中的观念论及其批判》,《翦伯赞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6页。
- [6]王昶(王学文):《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新思潮》1929年第1期。
- [7]杜荃(郭沫若):《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新思潮》1929年第2期。
- [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2-75页。
- [9]吕振羽《中国上古及中世经济史》,《吕振羽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 [10]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 [11]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 [12]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2辑,1932年3月。
- [13]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吕振羽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3页。
- [14]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38页。
- [15]周子东等《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 [16]翦伯赞《“商业资本主义问题”之清算》,《翦伯赞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90页。
- [17]何干之《中国社会史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336页。
- [18]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吕振羽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 [19]郑景《〈马克思主义之批评〉的批评》,《新思潮》1930年第6期。
- [20]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4页。

[责任编辑:陈双燕]

##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Common Academic Community

ZHU Ci-e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Gansu)

**Abstract:**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emerged during the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the 1930s. In the process,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formed a common academic community. Materialistic view of history was the academic faith and value target of the common academic community formed by Marxist historians. In the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not only expounded the basic Marxist principles, but also combined general Marxist theory with the specific reality of Chinese society. Judging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Marxist historiographers tackled anti-Marxist schools of thoughts, achieving a unity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an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findings in the debate on social history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to contemporar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social historical controvers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common academic community